

我和西方美学史(治学篇)

评茹志鹃《丢了舵的小船》(争鸣)

《我的前半生》编辑追忆(编辑手记)

发疯的钢琴——贝克莱小传(人物志)

左宗棠的最后几年(书稿选译)

汝信

丘岳

文达

商戈令

〔美〕贝尔斯

1984 3





哲学家 江苏吴江人，1931年生。
著作有与杨宇合著的《西方美学史论丛》
等。

探求真理，没有止境。

——汝 信

文艺理论家 北京通县人，1927年生。著作有《论中国古典小说的艺术形象》等。

你爱生命吗？那么别浪费时间，
因为时间是组成生命的材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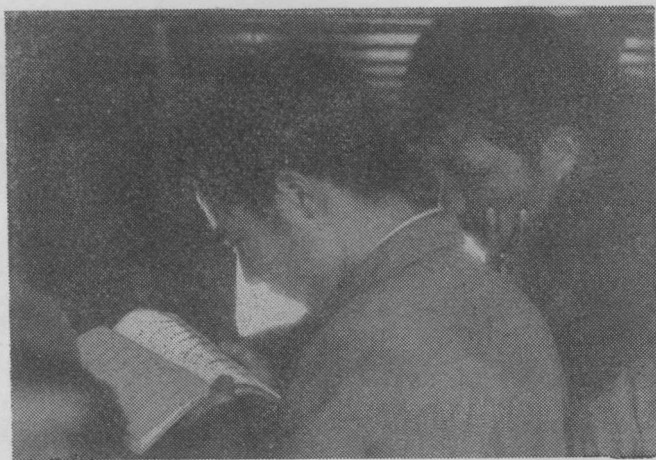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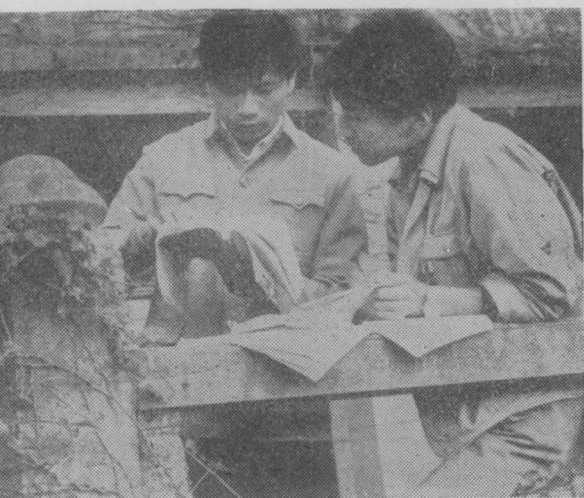
——李希凡



教育家 山西离石人，
1904年生。著作有《辛安亭
论教育》等。

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
苦作舟。

——辛安亭



2

最是读书乐无穷

郭继光 邵光潜 等摄

1. 交流
2. 列车上
3. 专注
4. 书店里
5. 盼望成材



4



5

C53
29:3

书林

1984年
第3期
(总第28期)
目 录

· 新书推荐 ·

《聂荣臻回忆录》(许力以) 《超越生命——哈默博士传》(温元凯) 《中国科学技术史稿》(陈麦青)(三)

· 作者与著作 ·

我与中国古典小说李希凡(四)
——《论中国古典小说的艺术形象》写作前后
《蛇国探秘》写作琐记劳伯勋(八)
我怎样编写《碑帖叙录》杨震方(七)

· 治学篇 ·

我和西方美学史汝 信(一〇)

· 争 鸣 ·

如果生活可以「拆建」丘 岳(一二)
——评茹志鹃《丢了舵的小船》
《这里的黎明静悄悄》.....及其作者金 陵(五六)
《大趋势——改变我们生活的十个新方向》范道丰(二〇)

· 随感录 ·

说书的利用率(冯英子) 有感于「顾问」署名(虎兆麟)(三三)
写点读书「教训谈」(张之)(三二)

同青年人贴心交谈

——读《生活,这样告诉我》

起步·勤奋·献身精神

——读《治学集》感言何金铠(二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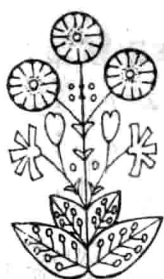
· 我的读书生活 ·

我爱读古代寓言祝 余(三四)
读书·积累·思索王维堤(三五)

· 编辑手记 ·

《我的前半生》编辑追忆文 达(一五)

漫话中国近代史论著苏双碧(三〇)
评《简明哲学原理》陆 煥(四三)
介绍《巴金创作论》穆新文(四九)
《阿英文集》简介道 弘(三六)
《领袖们》方 燕(六)



· 入门书介绍 ·

中国古典文学的入门向导

——《中国文学名著讲话》·····季晴(五九)

史部管钥——《史部要籍解题》·····相一(一九)

· 人物志 ·

发疯的钢琴

——贝克莱小传·····商戈令(六〇)

忆彭总在图圈中写「自述」·····郭云梦(二八)

谈迁两度写《国榷》(中华书话)·····金用(二二)

「孤岛」的《上海一日》·····应国靖(一四)

傅兰雅及其译书·····陈潮(二五)

本初健者莫轻言(炉边诗话)·····金性尧(五五)

鲁迅和书(下)·····王瑶(四〇)

词学浅谈答客问(上)(读书信箱)·····缪钺(五〇)

《语林采英》二题(我在读的书)·····丹红 建光(二六)



· 书稿选译 ·

左宗棠的最后几年·····W·L·贝尔斯著 王兆鑫译(三七)

小说中年代颠倒的妙用·····明之(四二)

古典文学选本类说·····周洪才 孙继亮(五二)

· 出版界 ·

中国青年出版社简介·····英夫(四四)

为当代青年提供更多更好的精神食粮·····蔡云(四五)

中国青年出版社部分书目·····(四九)

新书介绍：《革命烈士书信续编》《大后方》《简明科学技术

史话》《中华民族杰出人物传》·····陈吴苏等(四六)

书海记失·····(五三)

小书架·····(六三)

读者·作者·编者·····(五四)

辩证法粹言·····(二九)



C53
29:3

书林

1984年

第3期

(总第28期)

目录

· 新书推荐 ·

《聂荣臻回忆录》(许力以) 《超越生命——哈默博士传》(温元凯) 《中国科学技术史稿》(陈麦青)(三)

· 作者与著作 ·

我与中国古典小说李希凡(四)
——《论中国古典小说的艺术形象》写作前后
《蛇国探秘》写作琐记劳伯勋(八)
我怎样编写《碑帖叙录》杨震方(七)

· 治学篇 ·

我和西方美学史汝信(一〇)

· 争鸣 ·

如果生活可以「拆建」.....丘岳(一二)
——评茹志鹃《丢了舵的小船》
《这里的黎明静悄悄》.....及其作者.....金陵(五六)
《大趋势——改变我们生活的十个新方向》.....范道丰(二〇)

· 随感录 ·

说书的利用率(冯英子) 有感于「顾问」署名(虎兆麟)(三三)
写点读书「教训谈」(张之)(三二)

同青年人贴心交谈

——读《生活,这样告诉我》

起步·勤奋·献身精神

——读《治学集》感言何金铠(二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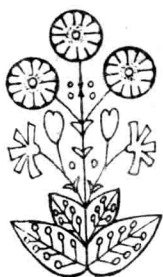
· 我的读书生活 ·

我爱读古代寓言祝余(三四)
读书·积累·思索王维堤(三五)

· 编辑手记 ·

《我的前半生》编辑追忆文达(一五)

漫话中国近代史论著苏双碧(三〇)
评《简明哲学原理》陆煥(四三)
介绍《巴金创作论》穆新文(四九)
《阿英文集》简介道弘(三六)
《领袖们》方燕(六)



蔡元培和《中国伦理学史》(中国现代社科名著评介)陈瑛(一八)

·入门书介绍·

中国古典文学的入门向导

——《中国文学名著讲话》·····季晴(五九)

史部管钥——《史部要籍解题》·····相一(一九)

·人物志·

发疯的钢琴

——贝克莱小传·····商戈令(六〇)

忆彭总在图圈中写「自述」·····郭云梦(二八)

谈迁两度写《国榷》(中华书话)·····金用(二二)

「孤岛」的《上海一日》·····应国靖(一四)

傅兰雅及其译书·····陈潮(二五)

本初健者莫轻言(炉边诗话)·····金性尧(五五)

鲁迅和书(下)·····王瑶(四〇)

词学浅谈答客问(上)(读书信箱)·····缪钺(五〇)

《语林采英》二题(我在读的书)·····丹红 建光(二六)



·书稿选译·

左宗棠的最后几年·····W·L·贝尔斯著 王兆鑫译(三七)

小说中年代颠倒的妙用·····明之(四二)

古典文学选本类说·····周洪才 孙继亮(五二)

·出版界·

中国青年出版社简介·····英夫(四四)

为当代青年提供更多更好的精神食粮·····蔡云(四五)

中国青年出版社部分书目·····(四九)

新书介绍:《革命烈士书信续编》《大后方》《简明科学技术

史话》《中华民族杰出人物传》·····陈吴苏等(四六)

书海记失·····(五三)

小书架·····(六三)

读者·作者·编者·····(五四)

辩证法粹言·····(二九)

书名：《聂荣臻回忆录》

聂荣臻著

战士出版社出版

推荐者：许力以

(中共中央宣传部出版局局长)



我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如饥似渴地读完了聂荣臻同志的自传体回忆录(上册)。回忆录展示了聂帅六十余年的斗争生涯，同时也反映了我国革命波澜壮阔的斗争场面。这是一部壮丽的诗篇，是一幅宏伟的画卷。

聂帅通过亲身的经历，又经过深刻的思考，如实地和生动地记述了我国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革命的兴起、壮大和发展，革命经受的挫折和取得胜利的艰难历程。他回忆起童年的境遇，农村的动荡和农民生活的苦难，给他小小的心灵打下深深的烙印。描绘了远涉重洋留法勤工俭学的生活，他怎样从一个爱国主义者转变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记述和总结了南昌起义、广州起义、开辟根据地和二万五千里的长征。

聂帅在自序中引了列宁的话：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他写道：“我的垂暮之年孜孜于此者，无非是怀着同样的心情寄热望于年轻同志，为他们学习党史军史提供一点参考材料而已。”亲爱的读者，让我们大家都来读这本书，我们必将从中得到教益。

书名：《超越生命——哈默博士传》

[美]鲍勃·康西丹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推荐者：温元凯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副教授)

名人传记对于一个人尤其是青少年的成长和成熟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从那些名人本身的成长过程中，也常常可以看到他(她)们是如何从那个时代的前人和同代人的传记中汲取各种营养的，有时候一本名人传记就能启迪一个人走上成才之路。



科技、教育、经济的发展正在有力地重叩我国体制改革的大门。改革在呼唤着人才，除了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政治家以外，现在该是到了向青少年推荐一些企业家传记的时候了。如果说，中国当代的四化建设各方面杰出的人才都很缺少的話；那末，当前最紧迫需要

的是企业家，需要造就一整代、一整层杰出的企业家，这样，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才有希望。这就是我为什么热切地向广大读者推荐这本列宁曾多次称赞过的美国著名企业家哈默博士的传记。

书名：《中国科学技术史稿》

杜石然 范楚玉等编著

科学出版社出版

推荐者：陈麦青

(复旦大学中文系研究生)



著名的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博士说过：“中国公元三世纪到十三世纪之间保持一个西方所望尘莫及的科学知识水平”，而且，中国的科学发明和发现“往往超过同时代的欧洲，特别是十五世纪之前更是如此”。那么，我国古代科学技术发展过程是怎样的呢？《中国科学技术史稿》一书，从我国原始技术和科学知识的萌芽，一直写到近代的科学技术，为读者展开了一幅我国科学技术起源发展的历史画卷。这本书共分十章，叙述很有系统，观点、材料都比较新颖，文字也颇通俗。在结语中，对我国近代科学技术发展为何迟滞落后，也作了较为客观的评论。这本书可以和中国通史、思想史、文学史联系起来读，能更完整地了解中华民族的文化发展，提高我们的爱国主义思想觉悟。我认为这本书不仅学理工科的同志需要读，就是学文科的同志也应该认真看一看。

《中国科学技术史稿》一书，从我国原始技术和科学知识的萌芽，一直写到近代的科学技术，为读者展开了一幅我国科学技术起源发展的历史画卷。这本书共分十章，叙述很有系统，观点、材料都比较新颖，文字也颇通俗。在结语中，对我国近代科学技术发展为何迟滞落后，也作了较为客观的评论。这本书可以和中国通史、思想史、文学史联系起来读，能更完整地了解中华民族的文化发展，提高我们的爱国主义思想觉悟。我认为这本书不仅学理工科的同志需要读，就是学文科的同志也应该认真看一看。



我與中国古典小說

——《论中国古典小说的艺术形象》写作前后

· 李 希 凡 ·

拙著《论中国古典小说的艺术形象》，是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第一版第一次印刷，是在1961年4月，只印了七千册。当年重印两次，增加三万二千册。由于这本书初版只收辑了我在1959年和1960年初写的十二篇文章，而其中关于《三国演义》与《水浒》的两辑，因与过去一些文章的论题联系密切，在这本集子里又读不到，所以，书出版后就收到了不少来信，查寻那些文章的发表园地，这促使我开始考虑要对这本书进行修订和增订。1962年春夏之交，我接到出版社同志的来信，谈及要第四次重印此书的问题。我复信表示，要乘再版之机进行一次修订和增订，取得了出版社的欣然赞许。关于这次修订和增订，我在《增订本后记》里，曾做了说明。

当然，即使有了这次修订和增订，它也只是一本侧重于谈论中国古典小说艺术形象问题的文章的结集，而并非研究古典小说的专著。增订本共收有四辑文章：第一辑三篇，是带有综合性艺术特点的探讨；第二辑是关于《三国演义》的四篇；第三辑是关于《水浒》的六篇；第四辑是关于《西游记》的三篇。它们也都并非对于那部作品的系统的论述，而多数是对问题的探讨和论辩。

几乎从《论中国古典小说的艺术形象》一出版，在六十年代初，就不断地有青年同志要我写文章谈谈写这本书的体会，直到最近，也还收到这方面的来信。读者的提问，首先唤起我童年的回忆。

大概还是在六七岁时，每逢盛夏之夜，我们那条巷里街坊四邻的习惯是，无论男女老少都拿着板凳、蒲墩以至抬出窗板，和左邻右舍聚集在风凉之处消夏。大人们是坐在那里摇着蒲扇品茶聊天，孩子们自然是追打打闹，很难使他们安静下来。于是，不知那家大人就会吆喝一嗓子：去吧，去听刘大爷说书，别在这儿闹啦！这时，我们就会围向西邻门口坐着的那位长须老人——胖胖的、高大的、威严而又和善的刘大爷。在我们这个小市民居民点的小巷里，刘大爷是操着何种职业，我记不得了，或者当时就没有注意。只记得还有个刘大妈，他们住在西邻大杂院的一间北房里。他没有孩子，但很喜欢孩子。所以每当盛夏纳凉季节，孩子们总喜欢围着他坐上一圈，一动不动地听他说书。我就是在他那里开始

听了《说岳》和《英烈传》的片段。他不仅善于说故事，而且把人物的神情状貌也描摹得栩栩如生。至今留在我脑子里的少年岳飞、王贵、汤怀、牛皋的影像，或者常遇春和他儿子常茂的战斗故事，都还有着刘大爷“说书”的清晰的印迹。

在拙著《京门剧谈》（将由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序言里，我还曾说过，自己在故乡万寿宫的评书场上“受了古典小说的‘启蒙’教育”。其实，在这方面给我以深刻影响的，还有我的父亲和他的特殊的教学方法。在我的故乡，妇女包括上了年纪的，都是不进说书场的。可是，我母亲的外祖家是住在通县北城门下，操织席业，那里是四通八达之地。她从小就养成了喜听评书的爱好。年纪大了虽不进说书场，却仍对“听书”有强烈兴趣。父亲想了个好主意，每晚在妈妈灯下做针线活时，就叫我这小学二年级生给她读一回《三国演义》，父亲则在屋里喝茶、吸烟、踱步，随时纠正我的错别字。至于从此而培养起我对古典小说的爱好，却恐非父亲的原意。

在我小学三年级的时候，父亲失业，家中经济情况恶化，我只得辍学而进了父亲的私塾。父亲在当时人们的眼里，是个半新半旧的知识分子。他自学英语，并做过北洋大学校长的英文秘书，而他自己又是读“旧学”出身，所以他的课程选材，也与真正的私塾不同。除通读《论语》外，《孟子》只选了几章；也选读过若干篇古代散文，如《滕王阁序》、《吊古战场文》、《祭十二郎文》、《讨武曌檄》；李白和李商隐的诗，是他素日反复吟诵的，自然也要成为我们必读的课程。最可怪者，是他还选了蒲松龄《聊斋志异》中的若干篇，要我们默写。那“默写”的方法也很特别，他先把原文用白话说给我们听，却让我们译成文言来回答，把答卷写在漆牌上给他看。答对了，他点头，再说下一句；答不对，他摇头，我们再回桌上去想。午前如多数人答不出，他就把这一段念出来让大家记下，下午自己去阅读、推敲、解释。全文默写毕，他再讲解一番。往往需时十天，才能默写一篇。这样，《聊斋志异》的文字以至风格，使我们印象很深，逐渐也能抓住它的特点了，以后的默写就容易些了。或许也是这种奇特的默写结出的果实，《聊斋志异》中的一些名篇，如《婴

宁》、《陆判》、《小翠》和《狐嫁女》，直到今天，我对其中的某些段落，还能背诵出来。但也正是这幼年的“学业”，把对古典小说的热烈爱好深深埋在我的志趣里，使我在十五岁以前，就已搜寻到包括《水浒》、《西游记》、《红楼梦》，以至《镜花缘》、《说唐》、《封神演义》等小说，读得入迷了。

解放以后，我有幸被党送进大学，读了中文系，而教授宋元明清小说戏曲的，又是国内外著名的女学者冯沅君先生，这更加培养了我对古典小说的喜爱。对于我国长篇章回小说中的五部第一流作品：《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儒林外史》、《红楼梦》，以及文言短篇集《聊斋志异》，阅读总在十遍以上，加上也已开始学习马克思主义和毛主席的著作，渐渐地也能从艺术感受中形成了自己的一些看法，但这些看法，却总和研究它们的著作对不上碴。譬如还是在大学三年级时看到的张政烺先生的《宋江考》，作为一篇考证的文字，它对宋江义军真实历史的探索，无论在史料上或水浒发展的脉络上，作者都提供了可贵的材料。但是，由真实史料而及于作为文学作品的《水浒》与作为小说人物宋江的艺术创造，作者却基本上偏重于否定的评价。它们使我难以接受，因而，不能不引起我进一步的思考。我还以为，在中国小说史上，这种“历史”与“文学”的矛盾，决非个别，而是有普遍意义的。结合着中国文学史的学习，我也查阅了有关的历史资料，我得出了与张政烺先生不同的结论。我认为，无论是说话艺术的发展，以及水浒故事和章回小说的产生，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都自有其现实的社会基础。亦即马克思主义所说的，作为上层建筑之一的文学作品，总是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创造”，是在“相当的基础上产生”的。当时，我就把对张政烺先生《宋江考》涉及到的这些问题的不同看法写了出来，这就是我写的第一篇谈论《水浒》的文章——《略谈〈水浒〉评价问题》（发表在1954年的《文史哲》上）。此后，又陆续写了这一辑中的其他六篇文章。其中除《〈水浒〉的细节描写与性格》一篇，别的五篇，大都从不同的角度围绕这个主题，试图用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分析、评价《水浒》的思想艺术，以及它所显示的中国小说的历史文学的特色。

1954年，我和蓝翎同志最初写的两篇文章——《〈红楼梦〉简论及其他》和《评〈红楼梦研究〉》，也同样带有这种论辩中思考的特点，因为它们关涉不到这本书，这里就略而不谈了。

1959年，在我国史学界发生了为曹操翻案的论争，而论争的“对象”，却主要是作为小说的《三国演义》，发难者自然又是历史学家。这一次也不是一篇文章的问题，它的猛烈的攻势，来自许多著名历史学家的宏文。他们说：“《三国演义》的艺术真实性失掉了基础”；“三国

演义》“简直是曹操的谤书”，它“丑化曹操，美化刘备”，对诸葛亮“更是推崇夸大”；作者罗贯中“是封建正统主义的积极宣传者”，等等。

如此声势浩大地、全面地否定《三国演义》，给我以很大的震动。的确，《三国演义》是有贬曹尊刘倾向，而且罗贯中作为一个封建时代的作家，在他的创作思想上烙印着封建主义的观念形态，也是庸庸诤言的。但是，作为一部流传几百年并为广大人民群众所喜爱的伟大作品，能用这种简单的历史对比而采取完全抹杀的态度吗？作为封建政治家的不朽的艺术典型曹操、诸葛亮以及刘备、关羽、张飞等艺术形象，不只是罗贯中个人的创造，它们还广泛地活跃在民间说唱艺术与戏曲舞台上。如果它们的典型和形象的概括，毫不具有历史的真实性与艺术的真实性，仅凭罗贯中的推崇与夸大，《三国演义》的故事和人物，能如此经久不衰、脍炙人口，深印在人们脑际么！这一切不能不迫使我重新阅读、重新思考。于是，我重新阅读陈寿的《三国志》，也搜集、阅读了可以找到的有关三国人物的野史、传说资料，我发现，在《三国演义》里，即使所谓“丑化”曹操的不少细节，也仍然是有来自文字记载的素材。它们反映了罗贯中对这位封建阶级英雄人物的创造，在历史资料的采撷上，还是下了一番集中、概括的功夫的。

当然，在这个问题的探索过程中，我更进一步思考了中国小说中与《水浒》相关联的这种特有的历史文学现象。就以曹操而论，在小说中我们应该看到的，更重要的还在于，它广泛地概括了封建阶级在政治舞台上的角逐者以至权臣的复杂而真实的精神风貌，这是作为历史人物的曹操所包容不了的。历史人物曹操的某些史实，在这里只不过是创造这一艺术典型的部分素材，而封建社会长期的复杂而丰富的政治斗争，才是产生它的广阔历史背景。这是中国小说中“历史文学”的特有现象。它不只在演义体小说里很普遍，也同样反映在戏曲舞台上。我们可以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分析、研究这种现象，却不能用历史事实的真实的尺度，对它们采取一概否定的态度。我的有关《三国演义》的几篇文章，就是记录了我在这样的论辩中思考的不成熟的意见。

《西游记》的评价问题，本来是1955年《人民日报》发表张天翼同志的《〈西游记〉札记》时引起的。只是当时我虽然有一些不同的看法，却并没有深入的思考。譬如象这样一部具有神话特点的作品，它的主要艺术形象孙悟空、猪八戒，在我国不只家喻户晓，而且特别为广大儿童所喜爱。对于它，是否可以简单地用划阶级的方法来分析它的神话人物的形象和性格呢？如果不是这样，那么，那又怎样解释它所反映的社会现象、社会内容呢？对这些问题，我也曾翻阅了一些资料，最终仍以为鲁迅先生的“神魔”说，是切合《西游记》的思想与创作实际

《领袖们》

方 燕

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先生,以他战后三十五年中访问八十多个国家、与各种各样的领袖人物接触交往的经历,撰写成《领袖们》一书(刘湖等译,知识出版社出版),受到了各国读者的注意。1983年8月8日,胡耀邦总书记在会见国际知名人士哈默先生时,请他将《领袖们》的中译本转交给尼克松先生,这本书对于人们了解二次大战以后国际舞台上那些叱咤风云的人们的性格、他们成功或失败的历史和经验,了解某些国际上重大事件的内幕,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尼克松认为:要把一位领袖列入伟人行列的可靠的公式,包括三个要素:一个大人物、一个大国和一个重大事件。这是因为,“领导一个大国的小人物在一场重大危机中无法证明他是否伟大,反之,领导小国的大人物,尽管他具有伟人的所有品格,也决不能得到承认”。因此这本三十多万字的书,只介绍了六七位领袖人物。他们是:温斯顿·邱吉尔、夏尔·戴高乐、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和吉田茂、康拉德·阿登纳、尼基塔·赫鲁晓夫、周恩来等。

在《温斯顿·邱吉尔》这一章中,尼克松把他称为“我们时代最伟大的人物”。在简略地介绍和回顾了邱吉尔的一生,以及作者与他的几次交往后,写道:邱吉尔在战争中是一位超群的领袖。他准备战争是为了避免战争。他争取和平,但不是不惜一切代价。对戴高乐,作者着重展示的是这位法国前总统“领导的奥秘”。他认为戴高乐关于领导艺术的说法既非常简单又一针见血:如果一个领导人把名望和魅力结合在一起,他就可以获得权威;如果在权威之外还有先见之明的话,就可

以成为历史上为数不多的举足轻重的领袖人物。关于赫鲁晓夫那一章,作者加的副题是:残忍和权欲。写了他们之间的几次交往,包括那次在厨房模型里的辩论,从各方面刻画了赫鲁晓夫的性格:有最粗俗的幽默感、敏捷的智能、为达到目的坚韧不拔的精神和攫取权力的残暴意志。作者以为“在这些方面,我所遇见的任何领导人都会自叹不如。在二次大战后的年代里,没有一位世界领袖人物的成败能象赫鲁晓夫的成败如此急剧地和决定性地改变历史的进程”。

许多中国读者对《领袖们》一书较有兴趣的是书中《周恩来——中国式的革命家》这一章。在尼克松与周恩来会面以前,基辛格就以他难得有的语气赞扬周恩来是“他所遇见的给人印象最深刻的外国政治家”。后来,在与周恩来的多次交往中,尼克松得出了他对这位改变中国历史进程的伟人的结论。他认为,周恩来是一位共产主义革命家,又是一位儒雅的人物;他既是致力于意识形态的人,又是一位精明的现实主义者。在扮演如此错综复杂的角色的人物中,很少有人能象周恩来一样,在思想上和行动上都应付裕如。这在很大程度上表明,他在政治生涯中有着漫长而又丰富的经历。作者以他自己的立场观点,分析了周恩来身上各种性格、素质,作为共产主义理论家,使他有可能利用每个历史时期的机会,并经受住政治上的挫折和物质上的困难;儒雅之士所具有的个人素质,则赋予他以超人的品德,使他成为亿万中国人民的“敬爱的领袖”;现实主义者的精明,又使他能够准确地估计国内政治和国际外交风云方面的潜在势力。书中还写了作者所了解到的有关反映毛泽东和周恩来之间友谊的情节,透露了周恩来卧病在床,奄奄一息时,长期深居简出的毛泽东到医院同他一起度过了他弥留的时刻。当时,除了照料周恩来的医生之外,毛泽东是与周恩来最后诀别的人。



的。我的三篇文章,都是从这一观点阐发了对《西游记》的评价。

我所记忆起的我和中国古典小说以及这本书的写作,大概只有这些,从此可以看出,《论中国古典小说的艺术形象》,并非一部研究著作,它只是记录了我在论辩中思考的一些意见。如果就对这些作品的评价来看,那却是很不周全、很不深刻的,但由于它们多数写于论辩

中间,所以尽管这本书已印了六次(“文化革命”前四次,“文化革命”后两次),除增订时改过一次,此后都未做大的修改,以保持它的历史面目。本来我还想对这几部小说做进一步研究,有一些题目要写。遗憾的是,二十多年来也再没有找出时间继续写下去。我很希望,在有生之年能有机会再了却这个宿愿。

1983年12月28日于南京

我怎样编写 《碑帖叙录》

杨震方

碑帖不仅可以作为一种书法艺术,更重要的是又可作为研究历史的实物资料。我国历代的碑帖资料异常丰富,仅石刻一项,在近人杨殿珣编的《石刻题跋索引》中,就收录了十六万一千余种。这些资料的内容,有政治、经济、哲学、宗教、文学、艺术、历史、地理、语言文字、科学技术等,几乎包括了整个的科研领域。

碑刻,最早见于著录者,当推南北朝时梁元帝(萧绎)的《碑英》一百二十卷,惜其书不传。直到宋时,曾巩欲作《金石录》而未就,仅存跋尾数则,现尚存《元丰类稿》中。与曾巩同时的欧阳修,又采摭遗佚,撮其大要,于嘉祐六年(1061年)完成了《集古录》十卷。以后又有赵明诚的《金石录》三十卷。以上两书虽号称广博,但均不著录碑刻全文。著录碑刻全文而著称者,有清乾隆年间王昶的《金石萃编》一百六十卷、同治年间陆耀通的《金石续编》二十一卷、清末陆增祥的《八琼室金石补正》一百三十卷。法帖著录,有清沈复聚和惠兆壬的《帖目》、程文荣和近人林志钧的《帖考》、近人郑裕孚的《汇帖举要》和容庚的《丛帖目》等。

近年来,爱好书法艺术的人越来越多,大家都希望有一部碑帖工具书出版,以作为阅读和收藏碑帖时的参考。上面的这些书虽在一定程度上可资借鉴,但与现代工具书的体例不免尚有一定的距离。作为碑帖工具书来说,至少应包括碑帖的刻成年代、出土地点、撰书者、行字数、递藏源流和对碑帖的评价等等。而上面的这些书,不能将这方面的项目全部包括进去。有关碑帖的工具书,国内出版的好象还未见到,只有少数重要的碑帖条目,附见于各种综合性的辞书中。国外虽有这一类书,但或语焉不详,或辞不达意,很少令人满意。为此我久想编写一部碑帖工具书,但限于一个人的力量,仅能先写出知识性的长编《碑帖叙录》(收录碑帖条目一千四百条,已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作为填补目前尚在空白状态的碑帖工具书。

我在编写《碑帖叙录》中,经过长时期的摸索,曾遇到不少困难,首先是碑帖的收录范围。碑帖的收录范围,大致可分为墓碑、墓志、刻经(石经、释道经幢)、造象、题名、题字、诗词、杂刻(砖瓦、法帖)等几个方面。如上面讲到的《石刻题跋索引》收录已达十六万一千余种,

其中还不包括新出土和新搜集到的碑帖在内。要从这么多的碑帖中,取舍选择,凡是常见重要的都不使漏列,这是一项非常艰巨的工作。

二是搜集资料。照例编写碑帖工具书,应对所收的每一条条目,都要与原件进行核对,取得第一手资料,但这项工作,单凭一个人的力量是很难办到的。尤其是有些新出土或新搜集到的碑帖资料,还在不公开阶段,不能借阅或见之于报刊,这对编写碑帖工具书来讲,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从而使好多重要的碑帖都无法按计划列入进去。

三是碑帖的现存地点和递藏源流。经过十年动乱,原来碑帖的存佚和收藏情况,有些已起了很大的变化,资料很难掌握,报刊上又少见报道。所以我在《碑帖叙录》中,采取了重点核对的方法,即对破坏得最为严重和藏有碑帖数量最多的博物馆、图书馆,分别发信进行了调查,来获得最新的资料。

四是碑帖的真伪问题。碑帖在千百年的流传过程中,不免混有不少伪作。在编写碑帖条目时,对伪作向读者交待清楚,也是一项非常必要的工作。但是对辨伪问题,见仁见智,各有看法,有些作品到目前为止,尚在争论阶段。如唐张旭的草书《古诗四帖》就是这样。还有对已定论的伪作是否收录,也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如岳飞的草书《前后出师表》,是明人白麟所作,但流传面广,影响深远,字也写得不俗。我在《碑帖叙录》中还是作了介绍,但讲明是伪作,使读者能得到印证和参考。

五是对碑帖的评价。这方面的书,从梁武帝(萧衍)的《书评》,到近代马宗霍的《书林藻鉴》,数量也相当庞大。有些书的评价,甚至为了迎合当时的潮流,不得不侧重于某一方面。如康有为的《广艺舟双楫》就是这样,贬低唐碑而称扬魏碑。所以我在编写《碑帖叙录》时,有所选择,自己作出判断,不人云亦云。

碑帖,作为历史的实物资料,已引起各方面的重视,如上海人民出版社已出版了《上海碑刻资料选辑》,在政治经济史料方面开辟了一个新资源。以前曾有报道说,有关方面已作出了编写《历代碑帖目录》的决定,这是极为令人鼓舞的事。希望在此基础上能更进一步做好碑帖工具书的出版工作。

小 启

本刊1983年第2至第6期尚有少量存书,需购者请向上海人民出版社邮购组(上海市绍兴路54号)购买。每本0.32元,平寄邮费免收,挂号另加0.12元。



《蛇国探秘》写作琐记

·劳伯勋·

《基度山伯爵》不愧是世界名著，可大仲马在书中把无毒的赤链蛇写成了是毒蛇；几年前，有出名噪一时的京剧，把一个反角称为“毒蛇胆”，其实，蛇胆是珍贵的良药。这说明，许多人对蛇这种动物还是相当陌生的。

历数动物王国的一百五十万种居民，无疑，蛇算得上是个颇带传奇性的角色。然而，尽管蛇对人类是功大于过，可是它所遭受的误会乃至蒙受的不白之冤，恐怕没有任何动物超过它了。尤其是在某些文学作品里对蛇作了种种歪曲的渲染之后，蛇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更被大大歪曲了。因此，每当我涉足蛇国探秘，便有一股热情驱使自己试用拙笔去为蛇鸣不平。

我在暨南大学的蛇园里，天天和蛇打交道，可以说，对这些“无脚朋友”的“感情”达到了“入迷”的程度。作家写文章，有个了解对象、培养感情的问题，一旦万事俱备，就有不可遏止的情思；我非作家，但写这本书时，在认识蛇这一对象上也有类似的情况。

有人以为我是个怪人，仿佛天生就是个“蛇迷”。实际上正好相反。早年，我曾不止一次在路上一碰到蛇，就心惊肉跳，赶快绕道远避。大学毕业后，我一直在高等院校从事生物化学的教学和科研。1975年，我在浙江医科大学从事蛇毒的生物化学研究工作时，为了取到蛇毒，只得硬着头皮开始向那些“无脚朋友”伸手。我的启蒙老师，是著名的蛇类学家胡步青老先生和黄美华副教授。尽管经过他们详尽讲解和实际操作示范，一旦动手，我的五指就有点不听使唤。首次抓的是竹叶青，说来它只不过是种个儿较小、不难对付的毒蛇。我鼓足勇气终于抓住了它的“七寸”，可是它略一挣扎，就急出我一身冷汗。手指在它的每次挣扎中将它越掐越紧。及至工作结束，啊呀，十多条蛇竟有四五条被我掐死了。后来他们告诉我，抓蛇的诀窍就在松紧合适，掐得太紧势必引起蛇的反抗，这一来就无法驾驭它了。此后抓蛇，我就不再那样死命地掐它的脖子了。此法真灵，蛇倒反而变得乖乖的了。

对于蛇的种种传说，在实践中我总爱问一个为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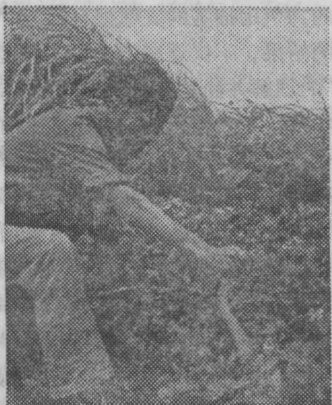
么？屡听玩蛇艺人吹嘘，说蛇能听他们的使唤。事实上，根本不是如此。莫说是大蛇，就是那些我天天与之打交道的蛇宝宝——幼蛇，对我也很不讲“交情”。1983年秋天，有一次正当我抓了一条幼眼镜蛇，欲饲养时，嗖的一下，另一条蛇便窜出缸来夺路而逃。不容思索，我急忙一把将它擒住。这小家伙可真狠心，嚓，嚓，接连在我指上咬了两口。民间传说，蛇越小越毒。我被大小毒蛇咬过不止十次，虽均因及时采取急救措施而脱险，可是从残毒引起的反应来看，大蛇就比幼蛇要厉害得多。幼眼镜蛇的残毒，只不过引起我伤处象豆大的红肿，隐痛一小时光景就没事了。

一般说来，动物是有固定食谱的。可是，也并非一成不变。如吃竹的大熊猫，也能吃粥吃肉；吃草的马，藏北地区却有人喂它驴肉。因此，我也探索着给蛇换口味。给幼蛇喂“奶”就是一项试验。所谓“奶”，实际上是用蛋白质、多种维生素、磷、钙等调配成的一种流质。倒也怪，吃“奶”幼蛇的成长速度竟比不吃的提高约一倍。蜗牛在广州郊野是不少的，用这喂蛇该有多好！可是，蛇却不爱吃它。秦牧先生告诉过我，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列宁格勒曾因肉类缺乏而苦于无法养活动物园里的老虎，结果，用兔皮包裹煮熟的豆类竟救了它们的命。在这启迪下，我参考有关资料后，就在动物的肠内灌进蜗牛肉，熏上蛇类爱吃的鼠类的气味后，蛇竟津津有味地吃起这些“蜗牛香肠”来了。

实践扩大了我的视野，丰富了我的想象，增进了对蛇的“情感”，……写作的材料也就呼之欲出了。

春春秋秋，历经五度寒暑，我终于写出了《蛇国探秘》。秦牧先生从此书酝酿到脱稿，始终热情地帮助我，指点我，并乐于为拙著作序道：“我读这本《蛇国探秘》的时候，觉得不但不吃力，而且颇有一种乘船顺流而下，一泻千里的快感”。

有些人迷信“落笔成章”，其实，好文章是改出来的。我看到秦牧先生在《蛇国探秘·序》的原稿上，就有着多处涂改。名家如此，更何况我们呢！



本文作者在野外捕蛇

为了改好这部书稿,我拜了两类师傅。一类是专业方面的师傅。在这方面,我用口头或通信的形式,就教过许多老前辈和众多的同行。这对于象我这样专业知识不足的“半路出家”的人是十分重要的。在写这本书的过程中,责任编辑石永昌同志先后和我通过约一百封信,作鼓励,论取材,谈构思,有时还帮我查核资料,寄参考书,等等,给过我很多帮助。另一类师傅是外行。这一类师傅,往往容易被人忽视。实际上,他们的作用同

样极其重要。每当我写好稿后,第一个读者总是我的爱人。她做过多年中学语文教师,从标题到构思,有时轰起炮来的势头可真够猛,这一来就有助于我进一步改写了。还有七八个孩子,也做过我的师傅。我曾把原稿请包括自己小儿子在内的中小學生看。他们讲起话来“百无禁忌”:喜欢处,指指点点,拍手叫好;讨嫌处,皱眉头,喊“不好”、“差劲”、“看不懂”,等等。对一些难点,我也请孩子们看后讲出内容来,一发现“走样”,自己就知道要改写了。

把知识的接力棒递送到广大群众手中,论文、专著等当然有其作用,但在一定程度上说,情趣横溢的文字是更易于被大家接受,因此就更具有威力了。比如,法布尔是很有名的昆虫学家,他写的《昆虫的故事》不知“招募”过多少人去从事包括昆虫在内的生物科学的研究。笔者之所以学生物学,就是受过他影响的。他写的书,象和昆虫讲悄悄话那般迷人。

在《蛇国探秘》序中,秦牧先生也在举手招呼:“我们期望有更多的科学工作者跨进科学文艺创作的领域”。笔者举手报名,并邀请更多的同志共同奋斗。

照片:欧松德 题图:白庚和

· 入门书介绍 ·

史 部 管 钥

——《史部要籍解题》

· 相 一 ·

我国的古代典籍十分丰富,人们经常用“浩如烟海”、“汗牛充栋”一类的词汇来形容其数量之多。传统的图书分类法将典籍分为经、史、子、集四部,史部则集中了历代各种体裁的史书。由于史部书籍很丰富,初学历史的同志往往有望洋兴叹,无从入手之感。中华书局出版的《史部要籍解题》一书,正是作者王树民先生为向初入史学领域的人指示门径的一本史部入门书。

我国史书的起源,可以远溯到上古时代,《尚书·多士》篇就有“殷先人有册有典”的记载。最初的史书可以分为记事和记言两种形式。春秋战国时期,产生了正式的史书体裁——以时间为中心,既记事又记言,比较完整地叙述历史的编年体;汉代司马迁写《史记》又开创了以人物为中心的纪传体史书体裁。从此,纪传体和编年体一直是史书的主要体裁,纪传体更被定为正史,纪传体廿六史也成为史部的主要书籍。至唐、宋时期,又

出现了以类相从编排史料的典志体和会要体史书。

《史部要籍解题》的作者,选择了各种体裁的史部基本书籍近百部,通过解题形式介绍给读者。“解题”也就是提要,这是一种通过对图书作者、卷帙、内容主旨的介绍和优劣得失的评价,向读者指示门径和提供方便的目录学体裁。《史部要籍解题》对每部要籍的介绍,都是围绕作者简历、编撰情况、内容评价和流传情况四个方面展开的。

结合成书的历史条件、政治背景,以及作者的观点、立场来分析、评价史籍的优劣得失,是本书不同于旧式目录提要之处。比如,作者是将《史记》置于汉初封建统一帝国的确立、以黄老之学施政的时代背景下加以考察评价的。又如,尽管编年体衰落,但由于唐以后全国统一时间较长,编写通史为大多数人所要求,这就是振兴编年体的史学巨著——《资治通鉴》产生的历史条件。《资治通鉴》保存了丰富的历史资料,但由于作者司马光的保守的政治立场,对历史的评价往往有片面失真之处,因而使用时要注意去伪存真。这样,不仅向读者介绍了书籍的特点,而且还引导读者客观地、全面地、历史地看待史籍的价值。

本书可以视为初学者进入史部大门的“钥匙”。有志于史学的青年同志,不妨一阅。



《书林》编辑部要我谈谈“治学”的经过和心得，真不知从何谈起。一则因为我虽然在科学研究机构里工作了二十多年，可是从五十年代起，一个运动接着一个运动，后来又遇上了十年浩劫，真正“治学”的时间实在并不多。二则因为我多少还有一点自知之明，知道自己才疏学浅，在学术研究的道路上除了值得记取的教训之外，并没有什么可以向人称道的成功经验。经过考虑，最后选择了现在这个题目，无非是因为二十年来总算在西方美学史方面出版过两本论文集，而且确实感到在业余研究这门学问的过程中多少有些甘苦想说一说。

我搞的专业算是哲学，别人说我是研究“黑学”的，这大概是因为我当过贺麟先生的副博士研究生，曾经跟他学习黑格尔哲学的缘故。实际上，我是半路出家，原来学的并不是哲学。我在解放前夕毕业于上海一所教会大学，主修的是政治学，副修经济学。在大学里不仅没有念过黑格尔的书，而且连一般西方哲学的知识也少得可怜。当时在教会大学读书必须选修有关宗教学的课程，因此我就选了已故的徐怀启先生讲的“哲学与宗教”，可以说这就是我在大学时期所受的全部正规的哲学训练了。那时根本没有想到以后自己会搞哲学，至于美学则当时大学里从来没有开过这门课，连它究竟研究什么也不甚了了。一个哲学上的门外汉后来怎么居然搞起西方美学史的研究，恐怕还得承认其中有偶然性在起作用。

1950年冬，我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正好赶上了第二次战役，然后又参加了第五次战役，从长津湖一直前进到三八线。在艰苦的行军中几乎把随身用品丢个精光，成了彻底的“无产者”，转移到后方后，却意外地发现，在出发前轻装时留下的物品中还保存着一本俄文的《车尔尼雪夫斯基选集》，它是我出国途经沈阳时在国际书店买的，就成为我当时在朝鲜战场能利用来提高俄语水平的唯一工具。这样，由于偶然的机，我开始接触到美学。《艺术对现实的审美关系》是我所读的第一本美学著作，也是我学习美学的启蒙书。我学俄语不久，要读懂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著作，其困难是可想而知的。在防空洞里微弱的烛光下，我逐字逐句地啃，反复去地捉摸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意思，有时简直是猜。当时我不知道这本著作早已有了周扬同志的译文，所以

还花了很大的力气用拙劣的文笔把它“硬译”了出来。这样硬啃生吞的结果，不仅逐渐增加了我对这位“俄国的普罗米修斯”的理解并油然而产生了崇敬之情，而且越来越使我对美学发生了兴趣。后来我虽然没有把美学作为专业，却一直把它当作业余爱好而不断地学习这方面的知识。现在回忆起来，在朝鲜的几年实在是我的学习生活中最美好的时光。我感激车尔尼雪夫斯基，是他的伟大人格感动了我，帮助我跨进了美学的门槛。我信仰马克思主义，当然不能完全赞同这位俄国革命先行者的

观点，但我和熟人聊天时总是把他尊称为车先生，因为他确实是我的第一位美学老师。

从朝鲜回来后，我转业到中国科学院做行政事务工作。凭着一个二十几岁的年轻人的干劲和勇气，我尽可能利用一切业余时间开始搞起研究和翻译工作来了。那时我除了发表过一篇关于经济学的文章外，还没有写过哲学文章。抱着试一试的心情，我牺牲了几个星期日的休息，写成一篇论车尔尼雪夫斯基社会政治观点的论文，寄给《文史哲》杂志，因为有同志告诉我这家刊物是最关心支持不知名的青年作者的。我的这篇幼稚的习作居然承蒙《文史哲》采用，这就大大地增强了我研究哲学的信心。我深感自己的哲学知识太差，特别是有鉴于列宁所说“不钻研和不理解黑格尔的全部逻辑学，就不能完全理解马克思的《资本论》”，因此就下决心在1956年投考贺麟先生的研究生。贺

先生收下了我这个哲学根基很差的学生，要我系统地重头开始阅读西方哲学史上的重要原著，当然更着重读黑格尔的一些主要著作。黑格尔的体系包罗万象，气魄宏大，但他的著作中真正使我喜爱的只有《精神现象学》和《美学》。《精神现象学》晦涩难懂，但确实思想丰富深刻，它本身就是一个令人百看不厌的成功艺术品。我把它和贝多芬的英雄交响乐一起，并列为法国大革命时代德国精神的光辉体现。至于黑格尔《美学》，则以它的博大精深使我认识到在理论研究中讲空话的无用。我们应该批判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观点，但他的那种根据大量实际材料说话的历史主义方法的确值得我们借鉴。研究美学，必须重视历史，重视艺术史，这是我读了黑格尔《美学》后得到的启示。那时朱光潜先生的流畅的中译本尚未出版，我只得利用奥斯玛斯顿的不太高明的英译



— 汝 信 —

本,把《美学》啃了一遍,觉得似乎还有一点收获,可以写篇东西把黑格尔和车尔尼雪夫斯基作一比较研究。我把这个想法告诉了贺麟先生,得到了他的同意和支持,文章写成后,由他作了认真的审阅,并推荐给《哲学研究》杂志发表。《论车尔尼雪夫斯基对黑格尔艺术哲学的批判》是我的第一篇美学史论文,它和我后来写的《黑格尔的悲剧论》都是这个时期钻研黑格尔《美学》的结果。对于象我那样的西方哲学和美学的初学者来说,先精读几部确有分量的原著,力求真正读懂,可能是比较好的学习方法。

黑格尔的《美学》大大地开阔了我的眼界,也使我对美学史的兴趣越来越强烈了。从黑格尔美学扩大到研究整个德国美学思想,往前可以追溯到鲍姆加敦、温克尔曼、莱辛、康德、赫尔德、席勒和谢林为首的浪漫派,往后可以延伸到叔本华、尼采直至哈特曼和海德格尔。就研究西方美学史的角度来说,以德国美学作为重点是合适的,在近代没有哪一个国家象德国那样具有如此发达和丰富的美学理论。车尔尼雪夫斯基说过,只有德国美学真正配得上称为美学。这不是夸大其辞,是有一定道理的。在马克思主义诞生之前,资产阶级美学思想发展的最高峰确实是在德国,只要把德国美学基本上搞清楚了,全部西方美学史的问题可以说也就解决了一半。当然,除了德国美学之外,古希腊哲学家、特别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美学思想也非常重要,这是以后西方美学思想的源泉。不了解古希腊,就很难真正理解西方哲学和美学,正如不懂先秦诸子就根本搞不了中国哲学史一样。近代德国美学思想家大多是古希腊的崇拜者,有些还是对古希腊有专门研究的学者,要读懂他们的著作非得有关于古希腊的知识不可。实际上,紧紧地抓住古希腊和近代德国这两头,下一些苦功夫,然后再往中间挤,假以时日,就可以逐渐弄清楚全部西方美学史概貌。这是我二十几年来学习和研究西方美学史的一点粗浅的体会,我自己就是这样走过来的。今后我还打算继续把西方美学史作为业余研究的对象,特别是认真地搞一下现代西方资产阶级美学思想。这是我需要补的一门课,也是开展思想战线的斗争所不可缺少的知识,尽管我一向认为资产阶级美学思想早已开始走下坡路,现在已经是强弩之末趋于没落了。

这几年常有一些青年同志来找我,希望我谈谈有什么研究西方美学史的好经验。我总是回答说,没有什么经验可谈,只是有一点意见供参考:这是一门扎扎实实的学问,请千万不要抱“走捷径”的想法。研究这门学问,首先必须掌握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对所研究的对象要有如实的了解,切不可根据从什么地方转引来的片言只语就急忙地做文章。老实讲,只要具备了必要的哲学和美学基础知识,能掌握一定的外语工具,又肯花时间,

那么,收集较丰富的美学史资料并不是太困难的事。真正困难的是要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对这些资料作出科学的判断和分析,这就需要认真学习,提高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的水平。据我看,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当然,这里说的不是到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去寻章摘句的那种本领,而是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分析具体对象的真功夫。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直接谈到西方美学史的言论很少,许多问题并没有现成的答案和结论可供我们这些人躺在上面睡大觉。因此,研究西方美学史特别要注意马克思主义的运用,发扬独立思考的精神。我深感自己在这方面做得很差,愿与同志们共勉。

谈到研究西方美学史,还有一点需要强调,那就是必须注意研究艺术史,提高对艺术的鉴赏能力,最好是实际参加某个方面的艺术实践,取得亲身的经验,在某个艺术领域内成为真正的内行。美学是不能离开艺术的,所以有人干脆把它叫做艺术哲学。了解一种哲学,可以通过书本,但要了解艺术则非通过亲身体验不可。对贝多芬的乐曲,你必须亲耳去听,对印象派的画,你必须亲眼去看,才能作出审美的判断。而且审美的能力也不是天生的,它有赖于后天的锻炼。如果缺乏必要的艺术鉴赏力,不具有有音乐感的耳朵和能感受形式美的眼睛,不去亲身体验,光根据书本或道听途说就来对艺术发表评论,这就难免会闹笑话。在美学研究中,这种想当然的做法是最要不得的。我自己多年来一直想努力提高艺术修养,但至今未能深入堂奥,对艺术仍然是一知半解。因此,对西方美学史的研究也始终只能停留在业余的水平上,这也许是我研究这门学问所得到的一个重大教训吧。

题图:王俭

“补”的什么“遗”?

《书林》1983年第4期卢正言的《伪装本和盗版书》一文,开头就提到上海古旧书店编印的《革命书刊伪装本目录》收录了解放前出版的伪装书刊187种,“但仍然有不少遗漏”;接着介绍了几种“郭沫若的伪装本”,说是“聊备补遗”。

卢文举的例子是郭沫若译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因国民党当局把它列为禁书,书商在重印时便把译者改署为“李季”。卢文所举的例子似和通常说的伪装书的特定含义不合。据唐弢《晦庵书话》说:“当国民党反动派残酷压迫,对革命书刊实行封锁、扣留、禁毁的时候,党和进步文化界……采取了一种权宜而又机智的对策:把书刊伪装起来。这种书刊封面名称和内容毫不相干,进步的政治内容,往往用了个一般的甚至是十分庸俗的名称。”两相对照,我以为卢文的举例,文不对题!

(上海书店 毕青)

如果生活可以“拆建”……

——评茹志鹃《丢了舵的小船》

丘 岳

如果生活可以“拆建”(拆开重建)……,这是茹志鹃的近作《丢了舵的小船》(原载《上海文学》1981年第8期,后收入《中国文学作品年编·1981年短篇小说选》)提出来的命题。它通过董毓德、章泯的遭遇和他们同陆阿才、秀珍的错综复杂关系的描绘,让董毓德和章泯发出这个呼唤,意思是他们可以抛开自己的丈夫、情人而结合在一起。作品的时间跨度甚大,重点则是今天的生活,董毓德和章泯的呼唤就是针对他们目下的情况而发的;故事的背景是一条将要拆毁旧屋重盖新楼的里弄,结尾时,章泯面对已经拆毁了旧屋,意味深长地说:“‘拆建’‘拆建’,原来不难”。显然,这个命题是为作者所首肯的。在大量涌现的爱情、婚姻题材中,这是颇具代表性的一篇。它触及到家庭危机问题,作者茹志鹃同志又是很有影响的作家,因此,值得提出来议一议。

《丢了舵的小船》对董毓德和章泯的爱情呼唤是用满怀同情甚至赞赏的笔触来加以描绘的,因此,小说首先值得讨论的问题是:他们“拆建”生活的要求是否符合社会主义的道德和精神文明?应该不应该提倡?我认为,回答只能是否定的。因为他们一个是有夫之妇,一个固然还算不上有妇之夫但已经同别人“敲定”了的。尽管他们两人过去的生活道路坎坷令人同情,但是他们在境遇有所改善后就背弃真诚地爱着自己的丈夫、情人而另求新欢,这不仅不符合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也有背于中国人的为人道德,不应提倡。

就以董毓德来说罢。她是在原来的丈夫陈彦被迫自杀之后同陆阿才结合的,目的是摆脱困境,使自己 and 儿子免受株连。结婚以后,陆阿才待她相当不错,各方面都对她颇为体贴。董毓德也承认,当时如果不是陆阿才便是另外一个柴阿才,“也许陆阿才更好一些”。可是认识章泯以后,她就产生“拆建”生活的想法,理由是:“家里应该有互相的理解,关切,应该有一颗互相牵扯的心,应该有话可说”,“有一个说话的人,有一个倾听说话的人……比一双有力的大手重要得多”。这理由不能说不。婚姻应该以爱情为基础,夫妻之间要有真挚的感情,问题在于她这个要求为什么不早点提出而偏偏在认识章泯以后提出?为什么此时此地她觉得“一个倾听说话的人”比“一双有力的手”来得重要?原因无他,拆穿

来说,乃是现在生活安定了,因而产生了喜新厌旧的思想。正是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她背着现在的丈夫和孩子同章泯拉拉扯扯。她这样做不仅背叛了昔日帮她度过难关的陆阿才,也对对不起同陆阿才相处甚好的儿子,人们对她的非议完全是理所当然的。

章泯也是一样。他是在处于逆境情况下同秀珍确立关系的,而且是由于他的挑逗所引起的。当时秀珍并不因他是“右派”、生活潦倒而嫌弃他,相反的,给他以支持。为此,她受到母亲的辱骂,忍受了精神上的压力。恋爱本身应该互相了解,倘使章泯由于发现秀珍在品质上和性格上的缺点而中断同她的关系,那自然无可厚非,但事实并非如此,他要求“拆建”生活乃是因为他和董毓德两人“互相依恋”,从中“得到了安慰和勇气”;而且他明知董毓德是有夫之妇,还坚持这么干,这更不可原谅。如果象他所辩解的那样,他对秀珍从来没有说过一个“爱”字,那说明他当时挑逗秀珍完全是出于玩弄的目的,这种行动更不符合社会主义的道德和精神文明,应当受到强烈的谴责。章泯还辩解道:他同秀珍那样亲吻、拥抱只是小事一桩,“在西方,连小事也够不上”。是的,这样的事情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根本算不上什么,但是请不要忘记,我们是生活在社会主义的中国呵!

从作品的具体描写看,不论是董毓德还是章泯,都是极端个人主义者,他们“拆建”生活的要求是以损人利己为前提的,完全建筑在别人痛苦的基础上。他们对此也不是不知道,可是他们却不肯悬崖勒马,而是在错误的道路上越滑越远,达不到目的就把它归咎于社会。章泯在意识到耽误了秀珍三年青春、应对其负责时,立即否定了这种想法,露骨地说:“那么我呢?我!谁耽误了我?又是谁来对我负责?我不管,我要‘拆建’我的生活!听见了没有?我什么也不管!”用不着多加解释,一眼就可判明这是一个极端个人主义者的自白,遗憾的是作品并未对此作出有力的批判,还用漂亮的外衣把它装扮起来,使其带着一种绚丽的色彩,似乎只有他和董毓德最懂得生活、懂得爱情,甚至为此不惜对陆阿才和秀珍加以丑化。小说给人这样的印象:象董毓德那样的画家,精神生活十分丰富,陆阿才那样头脑简单的工人是配不上的,只有章泯那样的知识分子才能成为她的